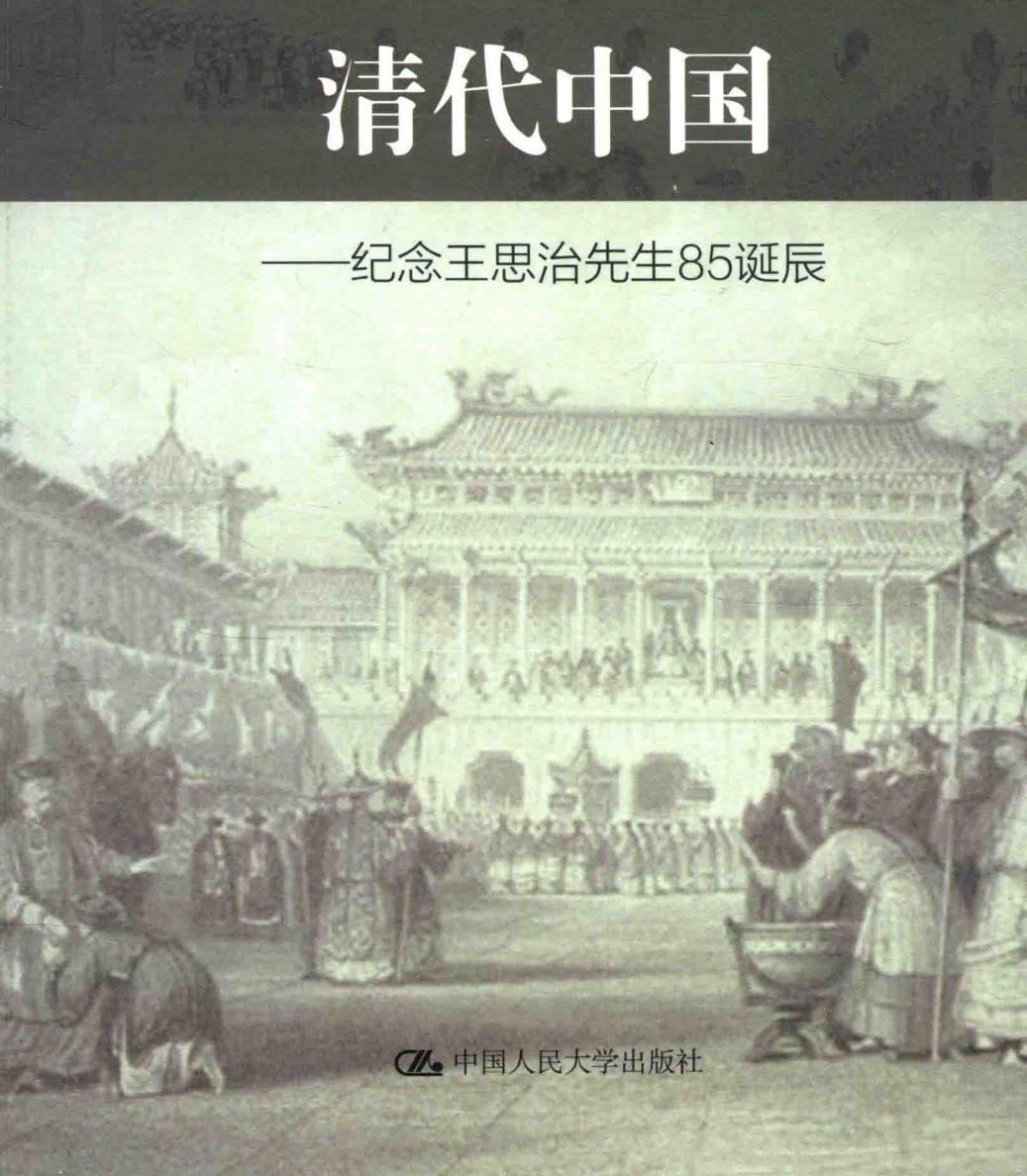


刘凤云 主编

宏观视野下的 清代中国

——纪念王思治先生85诞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刘凤云
主编

宏观视野下的 清代中国

——纪念王思治先生85诞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宏观视野下的清代中国：纪念王思治先生 85 诞辰 / 刘凤云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3

ISBN 978-7-300-22699-6

I . ①宏… II . ①刘… III . ①中国历史 - 清代 - 文集 IV . ①K249.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8473 号

宏观视野下的清代中国

——纪念王思治先生 85 诞辰

刘凤云 主编

Hongguan Shiye Xia de Qingdai Zhongguo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26.25 插页 6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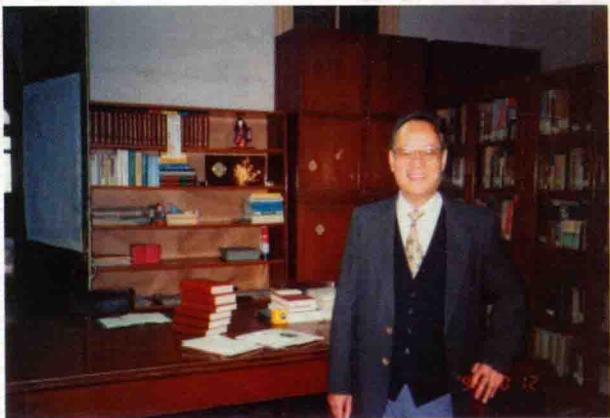
字 数 389 000

定 价 69.00 元



王思治 (1929—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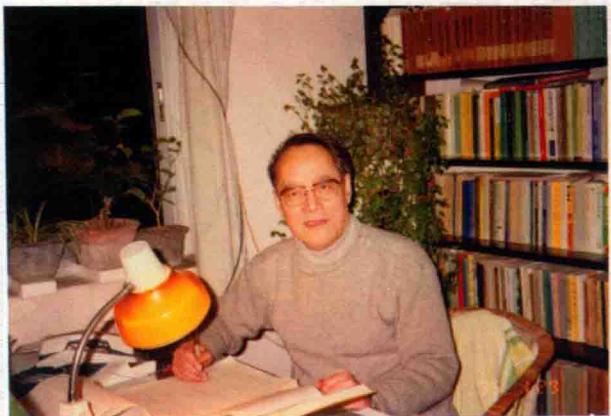
王思治先生在清史所资料室（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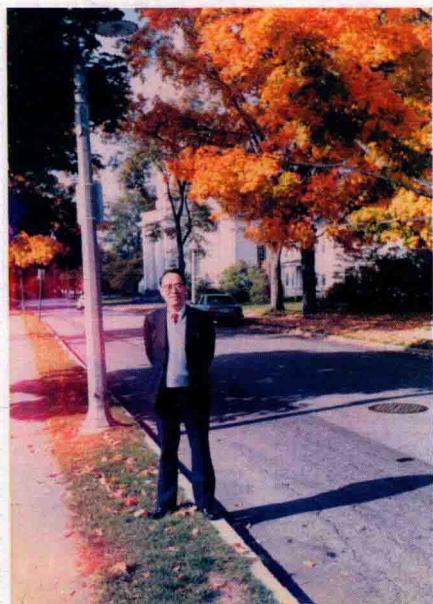


王思治先生在清史所资料室（二）



王思治先生在书房





王思治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



王思治先生在铁一号



王思治先生夫妇合影（一）

王思治先生夫妇合影（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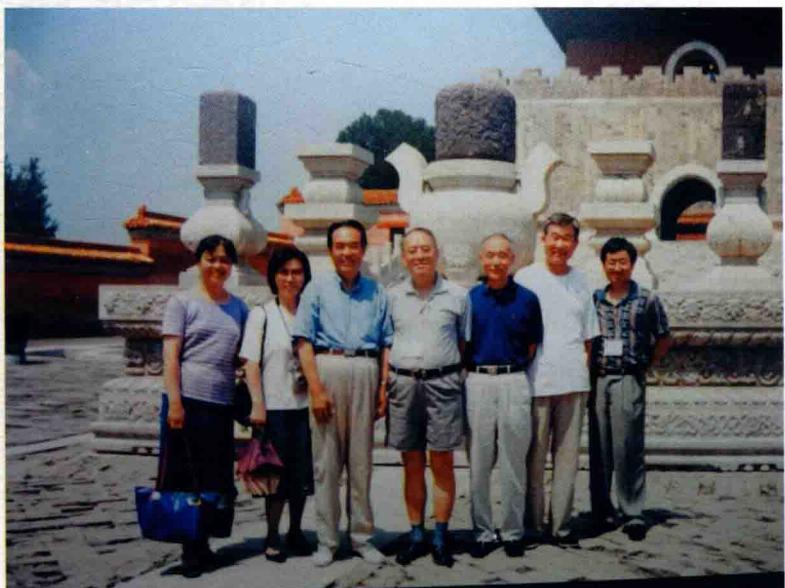
王思治先生夫妇合影（三）



王思治先生与清史所同事在盘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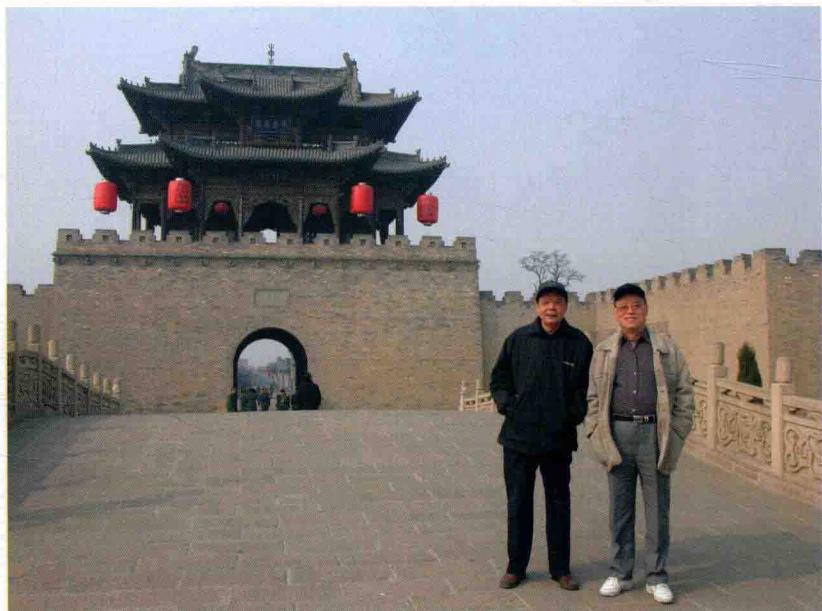
王思治先生与学界同人参观清西陵



王思治先生与戴逸先生



王思治先生和清史所前所长罗明教授在山西



王思治先生参加学生刘凤云博士论文答辩



王思治先生参加学生赫晓琳硕士论文答辩



王思治先生在「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与三位弟子合影



王思治先生七十寿辰与弟子合影



王思治先生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与
编审组成员合影



宏观视野下的中国史学与清代中国学术研讨会
——暨纪念王思治先生85诞辰 2011.11.1



王思治先生八十五诞辰纪念会议合影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王思治的清史学说（代序言）

刘凤云*

王思治（1929—2012）是清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他对清前期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人物以及相关制度的系列研究，为中国的清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司马迁说，他作《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在王思治的家中，一直挂着司马迁这句名言的条幅，它表达了王思治作为史学家的高远志向，也是他一生的学术追求。

王思治的清史研究多以鲜明的思辨性和寓史论于宏篇叙述中见长，在对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的阐释过程中，既能把握对历史内在规律性的认识，又能寓议论于流畅而翔实的叙述中，因而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引人入胜的思想性，这是王思治史学研究的最大特色。

早年，王思治主攻秦汉史，参与了中国古代史分期的“大论战”，成为“两汉奴隶社会说”和“魏晋封建说”阵营中的一员，发表了《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①等系列论文及著作，对社会性质划分标准、两汉生产力水平及生产关系状况、奴隶劳动的社会影响、中国奴隶社会解体的基本途径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史分期中“魏晋封建说”的分析和论证，通过阐述两汉奴隶制大量存在的史实以证“魏晋封建说”，并将其置于理论层面上加以探讨。他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分歧的原因何在？》^②一文中指出：土地私有制依次出现在

* 刘凤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① 原载《历史研究》，1955（1），见《王思治自选集》，20~5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② 原载《历史研究》，1980（5），见《王思治自选集》，3~19页。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三种社会经济形态里，所以土地私有制并不是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开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都不可只存在单一的生产形式，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是多种生产形式同时并存，而其中有一种是主导的、占支配地位的，由它制约并决定着其他一切生产方式，社会性质也是由它决定的；自耕农早在奴隶社会就大量存在，自耕农社会地位的变化动向，是阐明社会历史进程及社会性质的标志。王思治的上述观点，多有与前辈学者翦伯赞的讨论，且不乏精辟之论点，不仅在当时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且使“魏晋封建说”成为中国古代史分期诸观点中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王思治将研究重点转向清史，开始对清代政治史研究进行“精耕细作”，完成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在有关清朝历史地位、清初社会矛盾、明清战争、国家统一、皇位继承制度、历史人物评价、清前期中俄关系、承德避暑山庄、乾隆朝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两淮盐商的盛衰、宗族制度等论题上，多有精辟的阐述与论证。

从借鉴前辈治学经验的角度看，王思治的研究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而了解王思治的治史方法与见解，同时就多方面问题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和释读，也是本文的学术旨趣。

一、历史的高度：清前期历史地位的评价

如何评价清前期历史地位？是对清史研究的基本定位和定性问题，它牵涉到如何认识满族由部落构建演变成民族国家、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农耕文化与游牧渔猎文化的冲突、落后民族对先进文明的征服与融和，以及中国疆域的奠定与行政管辖的合法有效性等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与理论问题，直接关系到史学界对中国历史运行轨迹及走向等问题的认识与评价。

然而，明清鼎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引发的震动之大，对社会及人们心理带来的冲击之剧烈，是任何改朝换代所不曾有过的。顾炎武不以

“易姓改号”的“亡国”来看明清易代，而称之为“亡天下！”^① 这肺腑之痛足以表达了时人的政治认同。而何谓“亡天下”？顾炎武说：“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他看来，满人以夷狄入主华夏，取代了汉人的统治，就是“仁义充塞”。而清军入关，屠城杀戮，剃发易服，就是“率兽食人”，它摧毁了明朝的“文明世界”。王夫之也将清军入关喻作“夷狄之乱华夏”，故有“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的议论。^②

可见，明末清初思想家的认识，立足于“华夷之防”、“满汉畛域”的儒家正统观。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一正统观在时人思想及观念中所具有的张力，随着满汉民族矛盾的加深，在清末演变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口号，成为辛亥革命动员社会的能量。

从满汉畛域到民族革命，儒家的正统观虽几经解读、变异，但民族革命的思想除了被当时的革命者倡导之外，其影响力更是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学者中也是大有人在，而这一观念又直接影响到对明清易代的评价。诸如，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有多处直接的表述，有曰：“清以夷酋入主，威行专制，明世遗民，不惟抱亡国破家之痛，更具有光复中兴之心。盖以种族不同之故。”^③ 这种建立在华夷之辨基础上的认知，被学界称为民族革命的解释模式，对清王朝的否定是不言而喻的，它强调了清王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的断裂。

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学经历了对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历史人物评价诸多理论问题的学术争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阶级分析方法，以及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近代社会的矛盾学说，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其中从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对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探讨，尤其直接影响到学界对明清易代的看法。这从 1980 年清史学界组织

^① 参见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正始》。顾炎武有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② 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 4，《汉昭帝三》；卷 5，《哀帝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③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 1 册，892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的一次讨论中可以看出。

20世纪80年代，历史研究从诸多禁锢中获得解放，迎来了最绚烂的春天，清史研究也以明清鼎革为主线之一，形成以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清初社会矛盾、八旗制度、明清战争、清军入关与抗清斗争、清廷的统治政策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基础研究领域。但时值“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初期，对清朝历史地位的评价并未有实质性的改观，持否定态度者仍大有人在。如谢国桢说：“在十六、七世纪（明朝），我国科学技术本不让与欧洲，但到清朝却停滞不前。”而且他还认为，明朝在开拓边疆、巩固国防，以及社会经济、学术思想上，也都有卓越的成就，只是到清朝才落后了。^①显然，谢老的观点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在明朝达到了高峰，在清朝却处于停滞状态。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郑昌淦。他认为：清前期近二百年的历史，使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清后期七十年处于挨打的状态，就是前期近二百年落后的结果。他说：“统一的清王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主，拉拢汉族中最反动最腐朽的官僚集团，镇压各地人民的抵抗力量，建立起来的。它是明王朝反动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继续；在这一封建政权中，满洲贵族居于主导的统治地位，一切军国大事和重大政策都由皇帝和少数满洲贵族做出决定。既然满族社会是相对落后的，满族贵族所制定的基本政策必然带有时代的落后性。虽然他们逐渐地接受了汉族的经济和文化，但所接受的也大都属于落后的方面。”其结论是，清王朝的统治政策在某些方面也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都是次要的，从主要方面说，它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②

他们几乎一致认为，清朝是落后的王朝，它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之处于停滞状态。这与西方社会把18世纪的清朝称作“停滞的帝国”^③有着相同的结论。不难看出，他们的认识多受制于学术乃至政治大环境的影响，是在对清史缺乏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难免会失之武

^① 参见谢国桢：《对于研究明清史的一点体会》，原载《中国史研究》，1979（3），见《明清史谈丛》，248～25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② 参见郑昌淦：《明清之际的历史潮流和清王朝的统治政策》，载《民族研究》，1980（4）。

^③ 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在1989年出版了《停滞的帝国》一书，讨论的是18世纪的清朝。

断或片面。

除了“停滞论”的评价外，议论更多的是认为，清军入关中断了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例如，李洵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出版的《明清史》一书中，就明确将 1368 年至 1840 年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十个阶段，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消长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滋长为主线，对明清两代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了研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继续通过研究明代流民、海盗等，探讨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以解释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征，形成了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系列成果。他认为，发生在 15 世纪中叶到 17 世纪中叶的流民运动，“实际上是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运动，也就是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流民运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破坏了封建劳役制”，影响了社会的阶级关系，使“逐末”及城市浮居人口增多，市民基础扩大，至 17 世纪出现了市民运动。同时认为，16 世纪的中国海盗是流民运动的组成部分，它和西方海盗、日本海盗一样，是伴随国内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而出现的海外殖民活动。而正是由于对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长期研究与认同，李洵认为，清王朝的建立及其民族征服战争与民族政策，虽然对 18 世纪以后形成的多民族国家起了积极的作用，也有效地抗击了西北的沙俄侵略势力，保持了领土的完整，但清军入关，在全国实行了封建专制主义加民族统治，对封建社会的解体起了缓解的作用，对封建社会本身起了一种稳固的作用。认为四十天完成的明清鼎革在中国历史上不过是一瞬间，但所造成的结果却使我们的封建社会解体过程延长了一个世纪。^①

此外，傅衣凌也是相同观点的持有者。他认为，明中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万历时代是自由奔放的，有较多的新气息，到了雍乾两朝则严峻冷酷，闻不到人们的笑声。是以新的因素往往中断、夭折，处于马克思所说的东方国家不易产生资本主义的状态”^②。冯天瑜同样认为，清军入关中断了明代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综合各种资料，直到清代乾隆

^① 参见李洵：《四十天与一百年——论明清两王朝交替的历史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载《史学集刊》，1985（1）。

^② 傅衣凌：《从中国历史的早熟性论明清时代》，载《史学集刊》，1982（1）。

年间，我国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程度，才恢复到明朝万历年间的水平，清代整个社会的主体仍停滞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①

不言而喻，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对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和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认同的基础上的，所以有人将其称为近代化的解释模式。而代表新中国史学成就的“五朵金花”之一，即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是史学界用力最多、争议最久的一个话题，并在明清经济史研究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且由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还引发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中国近代化等相关问题的大讨论。应该说，对明清易代的认识，仍难免脱离这种学术认同的影响。但是近年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自身即具有缺陷，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也不应该是唯一的社会历史演进模式。所以，清王朝的建立是一种历史上的倒退，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致使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结论，也并非建立在对清朝历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最起码它忽略了清朝在康乾时期养育了三亿多人口的史实。

不容否认的是，迄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对清朝历史否定的观点，无论来自哪种解释模式，在当时的史学界都是占主导地位的。

但对上述观点提出批评和争议的声音还是存在的。如早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孟森就有针对性地指出：“近日浅学之士，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义，自失学者态度。”^② 他强调不应把民族革命的政治立场用于学术研究，而对清朝的历史真实性视而不见。

20 世纪 60 年代，刘大年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发表了应该充分肯定清代前期的历史车轮是向前进的学术论点。^③ 在 1980 年的大讨论中，多数学者提出应重新评价清朝的历史地位。如王钟翰指出：在康雍乾中叶以前这一个多世纪（1662—1765）内，“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还是居于当

^① 参见冯天瑜：《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载《历史研究》，1985（5）。

^② 孟森：《明清史讲义》上，364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③ 参见刘大年：《论康熙》，载《历史研究》，1961（3）。